

徐暢



先秦璽印圖說

說

比
徐暢

文物出版社



先秦璽印圖說

說

沈明
藏

☆ 徐暢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 陟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陆 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玺印图说/徐畅编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10-2591-6

I. 先… II. 徐… III. 古印(考古)—中国—先秦时代—图录 IV. K87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2719 号

先秦玺印图说

徐 畅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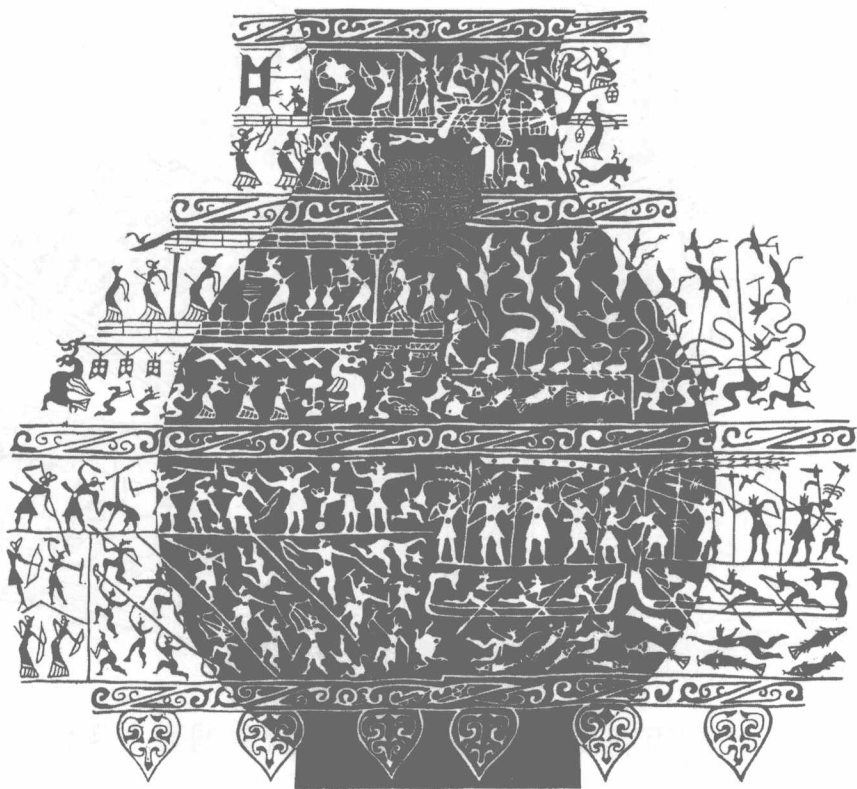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28.5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591-6 定价:110.00元



一、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摹本）

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1977年第4期、《中国古代青铜器造型纹饰》著录。纹饰分三层。

第一层采桑射庐图。宫廷射庐（或称射宫），楼房分上下两层，上层射靶，有指挥者及释获者。下层四人持弓练习，准备竞射。右侧有射猎和养畜图。

第二层左侧奏乐图，分两层。右侧射弋图。

第三层水陆攻战图。左侧为攻城图，上列一排为守城，步卒用矛刺，射箭，挥剑，掷石球作抵抗。下列用云梯攻城，云梯上有步卒执矛或盾剑进攻；云梯下有步卒射箭掩护。右侧为水战图。两船对峙，船分两层。上层水兵执短剑、长矛、戟对攻，有旗帜指挥；船的下层有水手划桨使船前进。水下有鱼，还有水鬼参战（图、文可与百花潭铜壶参校）。



二、成都百花潭宴乐水陆攻战纹错金铜壶（摹本）

战国前期时作。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文物》1976年第3期著录。圆壶前后两面图像是对称的。每一面有三层画面，各层又都可分为右、左两个图景，一共有六种图景。最下面的一行狩猎图像，只起花边的作用。

第一层左图：这是一幅竞射图。图的上方有射庐（射宫），其中有两人并射，即古书中所说的耦射。图左张设着侯（箭靶），两箭已经射中。竞射的两个人，一个引弓待发，另一个刚刚发弦，箭在侯道空中飞过，姿态均极生动。在侯的前侧，有一佩剑人双手举旌，是在箭射中时高声唱获（报靶）的“获者”。射庐左部阶上坐一人，是计算胜负的“释获者”，他手中拿的即记数用的算筹。射者右侧的持弓人，看来是指指挥竞射的。图的下方另有五人，有的执弓挟矢，有的徒手，作准备竞射的样子。此外还有鼎俎，三人正从事烹炊。（故宫铜壶上，有释获者而没有获者。）

第一层右图，图上方有树木两株。左面一株，枝间有一女子采桑，另一女子正在攀登。右面一株，枝间一男一女，皆以手援枝。树下有男子六人，女子五人，姿态个个不同。画中所有男子，装束和右边的竞射图中都是一样的，几人还有佩剑。（在故宫壶上，树前地面还陈放着猎获的禽兽），画面中的男子，有的以手中的弓示于树上蚕女，有的用两臂表

示弓形，有的用手和口扯弦，他们可能是在选取弓材。原来，桑科树木是古代制造弓干的重要原料。《礼记·射义》提到“桑弧”，而更良好的弓材是桑科的柘和檠桑（山桑）。《考工记》曾指出，造弓干的材料以柘为最好（传说著名的良弓“乌号”就是柘木制的），檠桑居第三位。柘叶古人也用来饲蚕，其树一般比桑树矮，叶多为全缘，不裂，与桑叶边缘有粗锯齿，有时呈不规则分裂不同。壶图中的树叶全缘无裂，有可能是柘。这幅图是以带有象征性的手法，表现了拣选弓材的场面。在故宫那件壶上，还绘有一个短装人半跪献弓，应为制弓的工匠，其图意更为显明。

第二层右图，图左有短装射者四名，用矰缴（系绳的箭）仰射飞鸟，四只鸟已贯矢下坠，另一只刚被射中。右首帐幕中五人，三人有裳，两人已更换短装。着裳的三人里面有一个手执弓箭，一个正在壶旁取饮。帐前排列着猎获的禽鸟，可见这种帐幕是供射猎者更衣休憩用的。帐幕以上的部分又是竞射图，一耦在竞射，另一耦在准备。侯的一旁，有一人看守着有盖的鼎。弋射飞禽的地方应该是泽。故宫壶上这一部分绘有池沼鱼鳖，池旁有伫立或者展翅腾空的水鸟，水上有驾舟持弓的猎人，其背景更为明了。《礼记·射义》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

画中所射的水鸟，从形状看是鹄。如李时珍所描述，“鹄大于雁，羽毛白泽：其翔极高而善步”（《本草纲目》卷四十七），即今天所说的天鹅。鹄不易射中，所以古人把箭靶的靶心称为“鹄”。铜壶的这个画面，把射翱翔的鹄与射侯上的“鹄”结合在一起，借象征的手法，以射鸟的命中陪衬射侯的命中，可谓极见巧思。

第二层左图：这是一幅宴乐图。图左上部表现一宏阔的建筑物，一贵者凭几而坐，壁上悬挂着一张弓，身后有执长柄扇的侍者，面前两人持觥进献，另两人侍立。阶下右方的两件长方形器可能是簋，圆形器是鉴。器右，四人执矛作舞。图的下部有钟、磬，建鼓，笙、箫的演奏。

第三层左图：攻防战。

第三层右图：水陆交战。此图比故宫所藏除旗帜之外，还有金、鼓指挥系统。

百花潭铜壶上的三层画面，中心主题可以归结为演武和攻战，正是春秋末以至战国前期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据《文物》1976年第3期杜恒《试论百花潭嵌错图像铜壶》节录）

三、琉璃阁 M59 战国狩猎纹铜壶（拓纹）

战国早期时作。《山彪镇与琉璃阁》著录。纹饰分七层，间以梭形纹：

第一层，两凤鸟相对衔蛇，鸟均为长冠、翘尾，足踏一蛇。尾下一小鸟，亦踏于蛇上。

第二层，中间立一操蛇神，蛇形角，双翼，鸟身，两手握蛇，足间一蛇。两旁二凤鸟鸟首向外，凤冠钩喙，各踏一蛇。操蛇神与两鸟间，各有一璧形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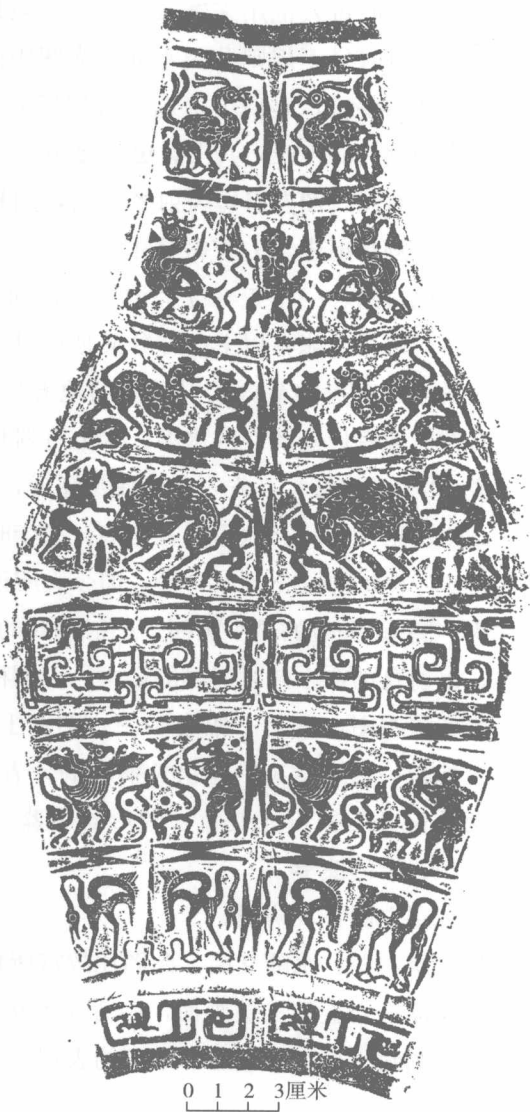
第三层，为左右两组相同的图案，一人持剑与豹（豹身有金钱斑纹）相斗，一矛已刺入豹颈；地上一盾，母豹身后有一幼豹欲逃跑却跌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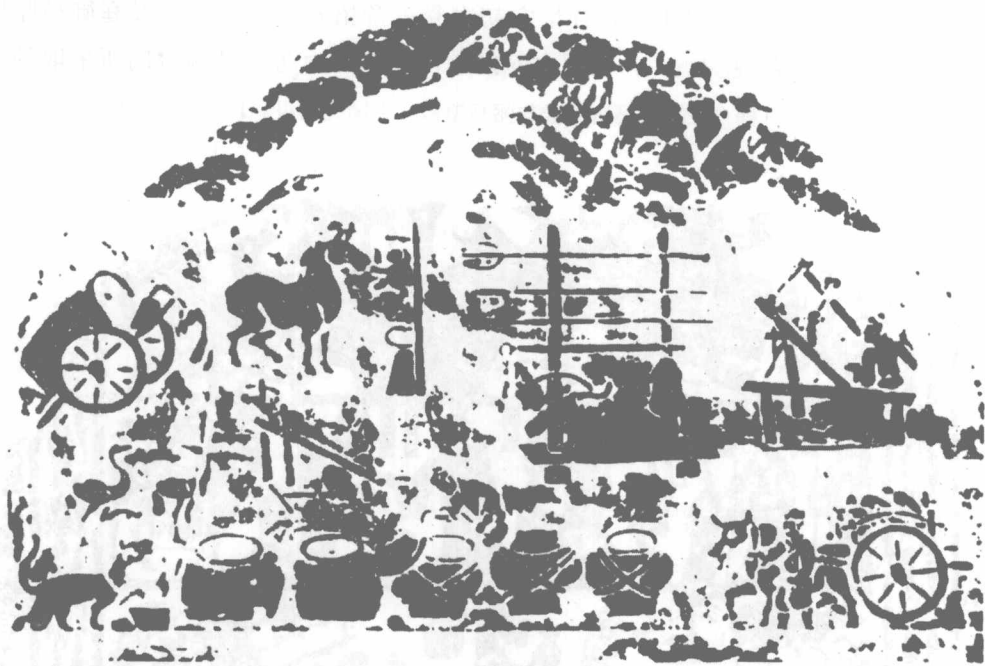
第四层二人围攻一兕，皆举剑持盾，两盾皆已落地，可见斗争之激烈。兕低头扬尾，奋力抵抗。兕上有一鸟，惊起腾飞。

第五层，为云纹、几何纹图案。

第六层，左右两组图案相同。为一人身鸟首的神怪，手挽弓箭，射一展翅欲飞的大鸟，大鸟亦作人身。下有两足虬，上有飞鸟。卜辞“𠩺”字（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也是鸟首人身状，其鸟喙形尤为显著。此鸟首人身神怪，可能就是帝俊的形象

第七层，左右两组图案相同。为两大鸟（长颈鹤）相背，足踏蛇，作张口欲啄蛇头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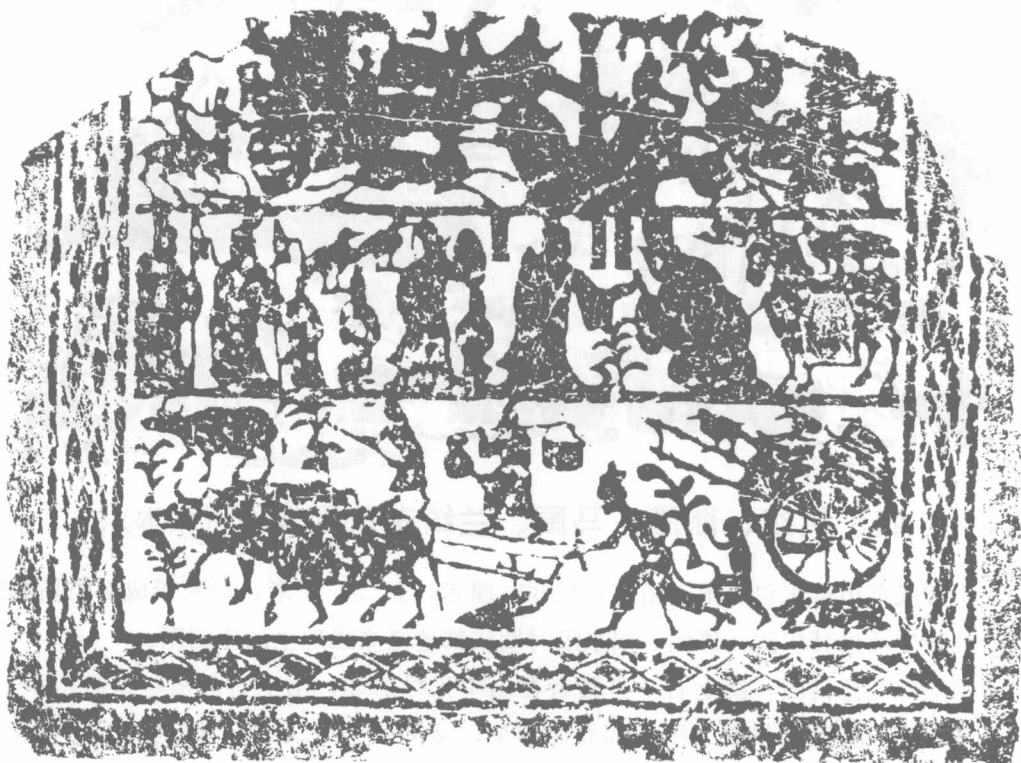
四、机织、酿酒、马厩、兰绮东汉画像石（拓本）

四川省成都市曾家包出土。拓片，长 300 厘米，宽 275 厘米，现藏于成都市博物馆。反映的社会生活极其广阔，俨然一幅东汉时期成都地区豪强地主的庄园图。

该图上部为狩猎图，图上右一狩猎者在山中张弓射鹿，山下有河流，鱼游水中，天空有飞鸟，系一幅渔猎景观。图中部立武器架，又称“兰绮”，架上横列着叉、戟、矛、环柄大刀，左侧挂弓、弩、箭及箭箠，右侧挂盾牌。武器架左右各有一部由织妇操作着的织机，两机结构不同，左繁右简，繁者机架斜置在织床上，显得很简单，似是当时民间使用的普通丝织机，表明当时既能生产高级的织锦，又能生产普通的丝织品。这是极少见的图像，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时期蜀地丝织业的发展和进步。酿酒是我国首先发明的一项古老的技术，图的下部酿酒图，自下而上表现有女郎提水，牛车送粮，坎者烹煮到列瓮盛酒，组织紧密，相互配合，生动地描绘了汉代酿制美酒的主要工艺过程，以及用酒糟及剩余物作为饲料，饲养着成群畜禽的情景。

更有趣的是该图上左侧有一篷盖车，中间有一匹膘肥壮实的马立于槽前，右侧槽旁有一立柱，上面悬系一只猴子，屈身面向着马，猴姿活泼，神态逼真。此图对研究汉代民风习俗具有重要价值。马厩内养猴，在公元六世纪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卷六中有记载：“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南朝梁时陶弘景《名医别录》、唐末韩鄂《四时纂要》、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皆有类似记

载。连吴承恩在《西游记》里也说，孙悟空初次受玉帝招安后，让他在天庭御马监里当养马官，官号“弼马温（避马瘟）”。马厩中养猴是古人在无力防治马病时期所采取的一种安慰自己的方法而已。（摘自任翔《马厩养猴与弼马温》，《中国文物报》1993.5.23.4）



五、牛耕小车东汉画像石（拓本）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江苏睢宁双沟出土。画面为线刻浅浮雕，高 79.5 厘米，长 105 厘米。下部中刻一农夫，一手握鞭，一手扶犁，二牛奋蹄向前。犁头呈等边三角形，犁上设犁箭以调节深浅。农夫身后一儿童提篮随墒撒种，其右停放一拉粪小车，车把上立一小鸟，车上还有两只小鸟，车旁卧一家犬。农夫身旁一人担水送饭，一人似在放牛。田间有嘉禾表示祥瑞。画像石生动地描绘了东汉时期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农田耕耘的景象，是研究当时农业生产和生产工具的重要文物。（摘自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388）



六、弋射、收获东汉画像砖（拓本）

成都市郊出土，成都市博物馆藏。拓片，40×49 厘米。此砖画像由上下两幅图组成，上图弋射，约占砖面三分之二左右。弋射是指古代以绳索系矢而射。《论语·述而篇》“弋不射宿”——猎射的主要目标是指天空的飞鸟。弋所发射的是一种“矰”，这种“矰”就是短矢。《淮南子·俶真训》：“矰弋射，身短矢也。”这种矰是被系在缴上的，缴是一种很轻的丝缕，《说文》：“缴，生丝缕也。”《淮南子·仿真训》：“矰缴机而在下。”缴的一端系着矰，另一端系在可滑动的石机上，这种石制的器具就是“礮礮”。此砖上部弋射图的右边，是一个莲池，莲花垂露，莲叶浮于水面。水下有大鱼数尾，水面野鸭游泳。莲池上空，一群雁鹭正在往东西两边疾飞，左端树阴下，隐蔽着两个弋人，正张弓欲射。弋者所用的短矢就是矰。矰后系着缴。缴的另一端系着可以滑动的礮。礮就是被装在半圆形的机械里，这大概就是《淮南子·俶真训》说的缴机和《楚辞·惜诵》所说的弋机了。

下图收获，所示在一稻田里，右端二人，以镰刀割禾，后面三人俯身张臂，收拾割下的禾。最左一人好像送完了饭，正担着禾担，手提餐具欲回去的样儿。这样逼真美丽的图画，可以与《诗经·豳风》的《七月》篇的“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的佳句媲美。（摘自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砖》4）

先秦玺印的文化内涵（代序）

中国玺印源远流长，有八千年的发展史。虽方寸之地，却包括史地、官制、姓氏、哲学、文学、文字等文化内涵和铸造、铭刻、雕塑等工艺，集实用、艺术于一身，确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精粹之一。

先秦玺印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我们口头上的常用词，一般来说都指科学文艺知识。关于“文化”一词的解释，约有三说：

一、“文化”既是大一统的手段，又是大一统的目标。

杨志刚认为最迟从春秋晚期开始，中国士人着手构拟一套“文化”理论。古代汉语“文化”一词，来源于《易传》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最早将“人文化成”转化为“文化”的是西汉的刘向。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以后《昭明文选》所收晋代束皙《补亡诗·由仪》又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化”就是文治教化。《逸周书·谥法解》：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锡民爵位曰文，愍民惠礼曰文，经纬天地曰文。总之，“文”是德行、智慧的总称，同时也代表着经天纬地的才干与气势。在传统观念里，这一切可化约为“礼乐制度”。因此，“文化”也就是礼乐教化。“化”说的是导引社会向上的一种变化、转化，古代思想家大都注重这个“化”功。《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与老子思想不同的是，儒家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和推动此“化”，以“文”化民，化民向“文”^[1]。

二、林剑鸣认为：“文化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而根植于文化深层的价值层次乃是文化的核心。”^[2]

三、黄留珠认为：“我们所说的‘文化’，不是单纯考古学的概念，而是把文化看作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3]

杨说是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解说的。以统治阶级的立场，“文化”是统治阶级的辅助手段，通过“礼乐制度”，实施文治教化，从而达到大一统的目标。

林说文化可以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几个层次。

黄说是从生产力（物质财富）和意识形态（精神财富）两方面来说明的。三说各有亮点，如合而化之则就比较全面了。

玺印自生发以来，在滥觞期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纹饰族徽参加物质财富的建设；玺印在成熟期以后作为权力象征、凭信和祈求物……流行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相配合，通过拜官授玺，辞官释玺、上下尊卑、封缄文书的泥封等制度，使玺印成为统治阶级的辅助手段，教化人民，达到其尊卑有序的大一统的目的。玺印以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政治、军事、经济、商贸、手工业、哲学、文化艺术等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自然也就产生了物质财富（经济、商贸、手工业等）和精神财富（哲学、文化艺术等）两个方面的成果，以及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几个层面上的关系。

先秦玺印的用途

先秦玺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与政治（官制、社会生活）、经济、哲学、军事、文化、体育、医药卫生、手工业、农业畜牧业、历史、文学、宗教、绘画、地理、建筑……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玺印文化的深层含义和社会意义大有探究的必要。粗粗罗列大约有如下课题：

1、玺印艺术与文化，2、先秦玺印的分期，3、先秦玺印的断代与分域，4、战国玺印的分类，5、图像玺与身份，6、物勒工名与商标，7、先秦玺印的用途，8、以职业为名为印，9、以商品名为印作封检之用，10、地名玺印非官印而是产地印等等。前六题在拙编《中国篆刻全集·卷一》、《中国书法全集（92）·先秦玺印》卷中都有阐述；第八、九、十题在本书中也有论证；关于“先秦玺印的用途”涉及面比较广泛，玺印文化的深层含义和社会意义也比较重大，其用途牵涉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两个文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现论述如下：

先秦玺印的用途

一、官印：权力身份的表征，佩戴使用。

战国时期有关玺印的文字资料更为丰富，《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商君书》、《史记》等古籍都有玺印的记述。诸凡丞相、郡守、县令等职官都由国君任命时发给玺印，免职时收回，制度非常严格。《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记西门豹为邺令，期年上计后被国君收回官玺。豹自请曰：“愿请玺，复以治邺……”《吕氏春秋·轨一篇》有“释玺辞官”的记载。《战国策卷五·秦三》《蔡泽见逐于赵》篇有应侯因谢病（因病请辞），请归相印（呈请归还相印），后“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蔡侯相秦王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明人董说《七国考·秦器服》云：秦国“有

司之赐印，自秦孝公变法始耳”。《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符节令汉少府属官，主符节事，遣使掌授节。秦称符玺令。”知“有司之赐印”当为符玺令所为，“有司”即符玺令，应当于秦孝公始设，任官赐印制度也应从此时始。从出土秦简看，战国时代秦国已经普遍实行了任官赐印的制度，并有种种立法规定。战国晚期已有“公玺”一说，而且此时官玺已规定有专人保管，丢失了“公玺”要治罪，即使后来自己找到了，也不能免罪^[4]。官玺可分为四类：

- (1) 中央政府职官名，如司马、司徒、司工、将军之玺等等。
- (2) 中央直属官署名，如大府、内府、筭籒、军市等等。
- (3) 地方政府职官，如侖（仑）守玺、平甸宗正、东武城工师玺等等。
- (4) 地方官署名，如句丘关、高陵筭籒、汝阳市等等。

二、表明自己贵族的身份，但与官玺有别。如君子、公孙、王孙、王子、冢子、上士、余子、子栗子信籒等等^[5]，与官玺一样可以抑于封泥，表示信誉。

三、泥封：官印封缄文书的泥封。泥封是古代抑印于胶质黏土，用以封缄书写在简牍上的公文、书信，作为目验玺印施用，以防奸宄私揭窃拆。“玺书”一词见于典籍《左传》之中，玺印在此时已形成封缄文书的制度，并且玺印已广泛地应用于社会活动之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武子（鲁卿）取卞，使公冶（大夫）问，玺书追而与之。”公元前544年4月，鲁襄公给楚康王送葬后返归鲁国，到了方城，发生了季孙宿占据卞邑的事，季孙宿派属大夫公冶去问侯襄公，接着又用玺书追交给公冶，命公冶报告季孙宿所以取得卞邑的原因^[6]。《国语·鲁语》也记有“季武子追而与之玺书”的话。

四、公玺用于封物。当时财物的封存，为官府收受货币，入仓谷物的封存，司法中的查封等等，都需要官府用印^[7]。《周礼·秋官·职金》记职金掌管有关金、玉、锡、石、丹砂和空青的戒令，接收作为赋税，以上述物资，辨明品质的优劣和数量，然后“楬而玺之”，就是说，用标签木牌加盖玺印加以封存。封泥也可以封缄墓葬中盛有物品的器皿、竹筍、陶罐、囊囊等物。也有直接在封缄容器时填泥于器口并加抑印章的“邾吴”封泥。1989年包山岗二号（战国中期）墓出土了一块罐口部封泥，上面连钤三枚“獬豸”图像玺。封物以表明信守是古代封泥的用途之一。泥封可看作是近现代火漆印封之法的先河^[8]。

五、公玺用于抑陶。在制造陶器（包括砖瓦）时往往在器坯上压抑制造部门或陶工的玺印——物勒工名——制陶官署名、职官名、生产者的姓名、里籍、身份（工师等等）、亭、市名、地名、器用名、年月、纪事等内容，以及合格证、使用者（器主）。目的是“归属标志和表示商品信用”。有时还打上吉语或箴言印^[9]。

六、公玺用于亭市贸易，封缄货物，交纳税收。《周礼·地官·司市》说：“凡通货

(貽)，以玺节出入之。”就是说货物的运输，以玺节作为出入关市的证明。《周礼·地官·掌节》说，货物通行用玺节。玺、玺节说明西周时玺印在社会活动和经济贸易、货物流通及税收方面，已经普遍使用。近年新蔡故城出土战国封泥有三晋、齐系、秦国及大量的楚系封泥，印文内容有姓名、成语、地名……还有大量的官名、官署名、市名、府名、手工业产品名……周晓陆推断新蔡故城当年是一处商贸集市重镇，有征税的官署，有秦邸专（传）送来的文书或货件，还有六枚图像鈐……又《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中也见有与商业贸易有关的封泥^[10]。据周氏称新蔡战国封泥，可能是市场用印之泥，属于公印性质^[11]。

七、公用玺用于铜器制范。铸造用单字玺见于铜器印迹，如秦公簠、能原铸、吴王夫差剑、越王太子矛、越王卜者旨矛等铭文以及兵器长条印压印迹、铜泡玺印与压印印迹。秦公簠、能原铸等用单字印压印，已开活字印刷之先河^[12]。

八、公玺可以封闭门户。《后汉书·隗嚣传》：“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元，王元，隗嚣部将。谓函谷关形势险要，只要少数兵力即可扼守。泥指封泥。一语双关，意即是用抑印之泥（所谓“丸泥”）也可以封其关门。丸泥起到了锁钥的作用。战国时的府、库、仓、廩之门，应即用封泥封缄，以免他人开启。云梦睡虎地出土《秦律十八种·仓律》云：“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这类说法在秦简中见到多条，显然应封在键闭锁钥之处，这应当是泥封的用法之一^[13]。

九、烙木印，烙在木材和漆木器上。信阳战国墓黄肠木上有火烙印迹（《古玺汇编·序》）。战国楚墓椁木上曾发现过烙印文字，湖北江陵县裁缝乡望山二号战国中期楚墓出土棺板火烙印迹“𡗗（昭）筭（鱼）”和“於（于）王既正（征）”（《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长沙省银行干校战国晚期木椁墓出土棺板火烙印迹“沅易（陽、阳）于口”（《文参》1956.12）。长沙出土“陈迁”漆器印迹（《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拙编《中国书法全集（92）·先秦玺印》187号）。秦和西汉前期的漆器往往烙有“亭”、“市”的印迹。1964年冬，山东五莲县王世疃迟家庄盘古城出土战国齐玺“左桁正木”十三方，现存八方（《文物》1986.3，图9～图16）^[14]。

十、烙马印，有的玺印是专用于打烙印在畜牲身上的，如燕国的“曠（唐）都萃车马”印是烙车马印^[15]。汉代的“灵上骑马”、“常骑”等印则系纯烙马印（参见本书《烙印篇》）。

十一、钤朱抑锦帛。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一文中，曾指出史籍关于使用朱色钤印的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卢同传》和《北齐书·陆法和传》，根据新出土的考古资

料,中国玺印使用印色的历史可以大为提前。1957年,在长沙左家塘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的一件褐地矩纹锦上,盖有朱印“囹圄”。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战国中晚期楚墓,在所出的一件对龙对凤纹绣浅黄绢面棉袍的灰白绢里,盖有朱印“府”字,在同出的塔形纹锦带上多处盖有相同的朱印“出”字^[16]。这种用印方法跟后世在纸上盖印的方法已经很接近了。

十二、土木工程的进度。江苏徐州有“土山”,为一汉代壅土王陵,每逢天雨,常见封泥暴露。其泥上常为汉代楚王、彭城王所领各县之名。周晓陆踏勘。见此王陵夯土层清晰,中裹有腐朽的木桩绳索等,封泥块常以近等距离而出土。于是周氏恍然而悟,原来是当时征发楚国彭城国境内土功徭役,兴建王陵,这表现了对一定时间(如逐日)对土方工程进度、筑造质量的检查之后,在丈量的木桩、绳索间抑印封泥,以示负责。在《周礼》等先秦著作中即有对土方工程督责的记载,而以封泥以计进度,该是一种必需的方法^[17]。

十三、量器用印及量器压印。“肖(赵)轨(廐)器容一斗”玺印计量器名称、容量。陶量秦始皇诏版玺印及印迹。或陶器上记其产地名及量器名称,如“陽城冢(鍾)”、“王豆”、“王区”、“公釜”、“公区”等陶器印迹。

十四、楚金币。玺印冷鑿于楚金钣上,俗称印子金。其品种有“郢畱”、“陈畱”、“廬(鹽、盐)金”、“尊(鄱)畱金”、“少贞”、“鄢”……以及冥币上的印迹、“郢畱”铜印、“匀蜀金”铜印^[18]等等。

十五、带钩印。带钩是束腰革带上的钩扣,与现在的皮带扣较为相似。在带钩上附有印章,亦取一物两用之意。带钩通常是用青铜铸就,名贵的则是用黄(白)金打就或玉石雕刻而成的,铁质的较为少见。出土带钩众多,但附印者较少,印文多为私印、成语印、图像玺。

十六、图像玺。图像玺源于上古时代的图腾和族徽,表示某种信仰或崇拜,如生殖、先祖、龙凤等崇拜,除动物图像玺外,多反映神话传说与故事(参见《诸神篇》)。

十七、在形态各异的动物纹饰中,又可划分为两小类:一类是写实动物纹,如象纹、蝉纹、鱼纹、龟纹等等,均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动物形象;另一类是幻想动物纹,即兽面纹、夔龙纹和神鸟纹等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神话动物形象。神话动物形象也能表示身份。如包山二号楚墓所出的獬豸图像玺表明墓主的法官身份(详《獬豸篇》)。

十八、成语玺。反映先秦哲学思想、意识形态、处世道德标准、社会风俗习惯、思想感情的流露以及人们对致富平安等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成语玺分属箴言玺、吉语玺、情语印三类。箴言玺系修身处世的规谏劝诫之语。吉语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健康长寿和家族发展兴旺的祝愿语;一类是关于财富和仕途发达的表述语,此类成语

多不见经典，可能是当时民间的俗语，或祝祷语。情语印系抒发男女之间情感的内容，数量不多，且多见于秦印^[19]。

十九、私玺。主要是姓名玺印及私人封缄用的玺印，约可分为五类：

(1) 单姓人名：如冷贤、肖（趙）浮等等。或姓名后加信玺二字，如王闲信玺等等。

(2) 复姓人名，如令弧买、公孙马、西方疾等等。

(3) 姓名与单名、别名、箴言、吉语、私玺、信玺的两面印。

(4) 单字姓或名，如陈、章、曹、昆等。但此类印不排除有地名印的可能。

(5) 私人用于封物，表示封缄的，如私鈐、封鈐、鈐、封等鈐印。私玺与地域氏族的关系非常密切^[20]。

二十、殉葬印。因有任官授印，辞官缴印的规定，所以出土的殉葬印中很少有官印，大多为私玺、图像玺和成语玺。殉葬印与丧葬文化关系密切。王人聪《新出历代玺印集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收有一些出土的殉葬印。

综合研究的新途径

先秦玺印因文字难识，相关的文献资料缺乏，所以研究起来困难重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罗福颐编辑出版了《古玺汇编》、《古玺文编》两书，收录了古玺印 5708 号，为古文字研究者和篆刻爱好者提供了研究和学习的范本。一批古文字学家考释了其中一部分未释与误释的字，把古玺印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我们研究古玺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将玺印、封泥与古文献相对勘是古玺印研究的重要途径。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质“羊纹印·汉”与包山岗二号战国中期墓出土的一块“三牛纹”封泥图像一样。报告称，兽纹凸起，头向下，一角前倾，前腿提起，后腿挺立，尾下垂，体呈抵触状，瘦如羊形。“三牛纹”与“羊纹印”几乎完全一样，只是玺印更为精致而已。究竟是羊纹，还是牛纹，或是其它什么神兽？时代是“战”，还是“汉”？包山岗二号墓墓主的身份为我们解决了长久未决的学术谜团。包山二号楚墓的墓主邵圻，官居左尹，是令尹（相当宰相）的重要助手，主管楚国的司法工作，相当现在的司法部长。由墓主的身份使我们想到“能别曲直”，“令触不直”的“獬豸神羊”，它是古代司法公正的象征。我们会恍然大悟：“三牛纹”封泥就是獬豸图像印迹。獬豸图像玺是左尹邵圻生前的佩印，以示自己廉明公正。獬豸封泥（即“三牛纹”）是邵圻死后家臣封物时所钤记。故宫收藏的“羊纹印”也应该是獬豸图像印，时代也应在战国时期（详见《獬豸篇》）。

上博收藏紉（絮）鈐，紉为紉的简体，亦即絮字，初不知其义，难以归属。近出一批新蔡楚封泥多有此字，也应是产品的标识。包山二号墓中棺第六层衾（丝绵被）上有紉字

封泥，原报告无释。此字从系从奴，应隶定作𦍋，说文：“𦍋，絮缁也。一曰敝絮。”敝絮，即粗丝棉，与丝绵被正合，𦍋封泥应是产品的标识（详见《染织篇》）。

对出土战国封泥进行综合研究也是古玺印研究的重要方法。

近年新蔡故城出土战国封泥有三晋、齐系、秦国及大量的楚系封泥，印文内容有姓名、成语、地名（襄、北邑、郢玺、新野、甘富、管）……还有大量的市名（成陵市、酃、酃市、酃、夕市、攻市、市）、府名（府、少府、行府、右府、东府、东门府、西府、南府、北府、北门府）、手工业产品名（襄、纹缁、玉、金缁）……周晓陆推断新蔡故城当年是一处商贸集市重镇，有征税的官署，有秦邸专（传）送来的文书或货件，还有六枚图像酃……又《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中也见有与商业贸易有关的封泥，据周氏称新蔡战国封泥，可能是市场用印之泥，属于公印性质。对某些玺印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如“信、仁、质”字印，一般认作吉语印，现知道应为商业质证告诫凭信之用；又如所谓“肖形印”，至少在这批封泥中，仿佛有商标的作用^[21]。

周氏的判断正确无误，经综合研究以后，还可以补充几点：

一、征玺，系征税的官署，表明货物已征税，可以放行或入市。

二、这里的府应是县府，少府应是直属中央的地方少府，或中央的少府派驻地方的机构。分方位所设的门府应是征税的实施机构。县府、少府是征税储存机构。

三、新蔡城之外多处楚城邑的封泥，都是作标明产品的产地之用，“反映了楚国境内不同城市间的商贸活动”。地名封泥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过去我们以地名为官名的认识是错误的；这些地名玺印多是打印在产品货物上表明产地的。地名封泥是产品产地的标识。传世地名玺印，如洵城、平阿、右州之酃、周城之酃等等，应是钐于产品封检封泥上表示产地的用印。陶器印迹格氏、咸阳、阳城、平甸等，表示陶器的产地。郢再（稱、称）铜玺、“陈禹”等楚金钣印迹表示金钣的产地。

四、“尔（玺）”单字楚系封泥。玺，不著姓名，《玺汇》中有大量的“玺”字单字玺（5225～5258等），或单字，或从金，或从土；还有“封”、“封玺”等都是私人个体户或行商交易时用于封缄，以表信誉，防私拆。新蔡所出秦系封泥有尹咸、李崇等姓名印同此作用。

五、“两”单字楚系封泥，“四”单字楚系封泥，皆表明货物数量之标记。

六、“器”单字楚系封泥。秦印有市器，即市所造之器。“器”为市器之省。

七、“昌”单字楚系封泥。有美善、正当、美好貌、兴盛诸义，或言贸易正当守法，或言货物卖相好，或言买卖兴隆，财源滚滚，都与商贸有关。

八、图像封泥龙形（蛇）、立鸟形、虎形、猿猴、麋形。楚地多蛇、虎、猿猴、麋之类的兽类，多有经济价值。这些图像封泥应是狩猎产品的标志。